官员型独董辞职潮 预示“政商旋转门”将关停

金开尔

> 由“审批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是消除官员价值异化的治本之策。约束责任官员的权力，消除巨大的“官场价值”，有助于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和企业的健康发展。

自2014年1月1日以来的70多天内，共有超过90名独立董事辞职，最短者任职仅一个月。独立董事辞职已成为近期上市公司的一大看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匆匆”辞职的独立董事都有着光鲜的真实身份，他们或是政府官员，或是国家科研机构的头头脑脑和大专院校的校长、书记。很明显，这些人掌握着众多的优质社会资源。

很多研究文献表明，有从政背景的独立董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司争取资源，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事实上，企业热衷聘任政府官员型独立董事，也是基于对于某种特殊资源或者特殊渠道的依赖。

“中组部‘18号文’出台后，有从政背景的独立董事纷纷辞职，上市企业断了一条人脉，可能会受到影响。”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尹志超坦言。

从积极的层面看，政府退休官员的“政治生命”结束并不意味着其经验和能力的消失，通过到企业任职等方式，可以让其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在政府退休高官中，不乏学识水平、管理能力都非常出色的高端人才。但目前国内企业挑选独立董事，更多还是受企业董事长的学习意识、民主作风、社交网络、政治背景以及企业财力等因素的影响，很少请中介机构对拟选的独立董事进行资质调查和可行性论证，往往把所聘任的独立董事的人脉、资源、声望当做首选，以图提高企业对社会优质资源的更多占有。一定程度上，一些企业只是把独立董事当做“门神”供奉。

在国外，独立董事在公司内部维持中小股东的利益，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代表社会对公司进行监督的作用。在中国，独立董事往往有着其它特别的意义。中国企业更喜欢利用附着在退休官员身上的“官场价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有能力影响到审批环节。之所以热衷于聘请政府退休高官到企业任职，正是看中了高官们犹存的“余威”而不是“余热”，希望利用高官们在相应政府机构的影响力和沟通能力，在审批等方面获得各种便利。

显而易见，政府权力过大，特别是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过于集中，是退休官员型独立董事由“管理智慧”异化为“权力掮客”的根源。而这种由智囊变身“掮客”结果就是官员型独立董事用其身份的特殊性，为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

如何克服高官型独立董事价值的中国式异化，让政府官员在退休后释放更大的价值和能量，使原本短缺的高层次人力资本得到更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18号文”要求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即使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任职)，也必须从严掌握、从严把关。

中组部的“18号文”还规定，对于已退休的领导干部有3年的“锁定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社会的权利迷信，预防一些退休官员对权利的格外迷恋，把为企业打通官方渠道，谋求“官场利益”看做是自己能力和价值所在的现象发生。

新一届政府更为注重将“审批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也是消除退休官员价值异化的治本之策。约束责任官员的权力，消除巨大的“官场价值”，有助于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和企业的健康发展。

“18号文”强调，凡按规定经批准到企业任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及时将行政、工资等关系转入企业，不再保留公务员身份，不再保留党政机关的各种待遇。不得将行政、工资等关系转回党政机关办理退(离)休；在企业办理退(离)休手续后，也不得将行政、工资等关系转回党政机关。即党政领导干部不得“两头占”，不能既保留公务员身份及相关待遇，又在企业领取报酬。

这一规定，使得这些“两头占”的独立董事们纷纷辞职。独立董事辞职潮的出现，似乎在验证“权力寻租”现象的严重性，同时也说明“权力磁场”正被逐渐打破。

高校企业国资改革的方向：混合所有制和资本运营

刘震

>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完善，校办企业与高等学校在功能定位、行为目标等方面产生了愈来愈明显的分歧和不一致。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等部门最新发布的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年末，全国489所高校3478个校办企业的资产总额为3190.26亿元。这一结果的发布，再次将高校经营性国有资产(俗称“校办企业”)的监管和改革等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民众不禁会问，对于如此庞大的校办企业，谁来监管、谁来运营、谁来受益。

高校如何推动新一轮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高校校办企业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产生初期，作为学校的一个部门，直接受学校党政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学校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采取行政直接干预的管理方式，同时作为企业资产唯一的所有者承担无限责任。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完善，校办企业与高等学校在功能定位、行为目标等方面产生了愈来愈明显的分歧和不一致。正如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院士所言，“校办产业存在大量的‘无限责任’性质的公司，学校直接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在资产、人员、地域等方面校企不分，企业本身的运行和管理亟待规范；没有建立起学校对企业投入、撤出的良性退出机制。”

大学投资企业很重要的两个理由，一是能够给高校一定的资金支持和回报，二是也可以推进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但这两个理由有多少存在的依据和支持的数据？高校校办企业“校企不分”等老问题仍然存在，同时还有一些新的问题不断出现。

一是履行出资人职责，高校是否胜任？高校作为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培养人”为核心目标，是否胜任出资人这个职责，确值得商榷。

二是国有资产，特别是无形资产的流失。“校企不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往往最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将高校的无形资产通过市场资本化后，为小团体甚至是个人谋利的现象更加隐蔽，实则也属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范畴。

三是阻碍科技成果转化体制的创新。在市场化成为经济体制改革主旋律的当下，校办企业已经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体制创新的阻碍，表现为转化效率的低下和屈指可数的成功案例，大量的科技成果反倒因为现存的体制得不到有效的转化。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曾为我国高等教育和科技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校办企业。关键是正视现实、深化改革。

在产权层面，高校角色由出资人代表转换为股东投资者。通过产权划转、兼并重组、公开市场交易等方式，实现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所有制的改革，高校不再履行出资人职责，按《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规定，教育部所属高校的校办企业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省属院校的校办企业由各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

在运营层面，高校任务由资产监管转化为资本运营。在实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高校企业有一部分股权和资产可以变现，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将这一部分资金成立学校发展基金，由该基金代持高校在企业中的股权，高校不再直接参与企业资产的管理、运营等工作，同时通过市场进行资本运作，进行多元化的投资，如不动产、政府债券、股票、债券以及对冲基金等，保证每年获得较高及稳定的收益以用来支持高校的发展。

通过产权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运营层面的资本化改造，高校校办企业不仅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成为了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体，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又为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别让“寄生中介”截流了改革红利

三清言

> 一些中介组织“寄生”在权力体制内，与政府部门和官员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截流改革红利，市场和企业不能从改革中受益，让人担忧。

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正被权力部门下属的中介机构“截流”，行政审批的许多痼疾尚未得到根本缓解，企业纷纷反映负担难言减轻。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与行政审批相伴而生的第三方中介评估事项近年不断增设。

实行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是新一届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特别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行政审批事项的持续减少，已成为当前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让人看到了新一届政府锐意改革的决心和勇气。然而，一些中介组织“寄生”在权力体制内，与政府部门和官员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截流改革红利，市场和企业不能从改革中受益，让人担忧。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许多人都发现一个新现象：虽然行政审批的项目少了，但需前置评估的项目却多了。据九三学社中央这份提案统计，目前贯穿于行政审批过程中的第三方中介事项约有30余项，主要形式为技术性审查、评估、鉴证、咨询报告或意见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可行性研究、节能、地质勘探、施工图设计审查等。这些中介服务的结果都是职能部门受理审批的前提，更重要的是这些中介业务耗时长、态度差、收费贵，大大加重了企业负担。2013年，浙江省人大财经委对2000多家企业进行投资环境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企业感到最耗时的是中介服务，其中十多个项目的服务时限为2个月以上。据测算，中介服务时间约占项目全部审批服务时间的60%—70%。显然，这样的结果已经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必须厘清政府、市场和中介组织三者的关系。政府必须收回“万能的手”，把不该管的放开，把该管的管好；市场必须发挥资源配置的主体作用，通过完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中介组织必须依法履职，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发挥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然而，目前的状况是，我国中介组织的发展并未跟上改革和市场的步伐。一方面，中介行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总量上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二是缺乏明确、统一、有力的行业规范和制度规则，导致中介违法现象普遍。一些中介组织身份暧昧模糊，与主管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成为“二政府”；一些中介组织与不法人员勾结，侵害国家利益，成为腐败的催化剂；一些中介组织对企业吃、拿、卡、要，滋生出新的腐败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革的成效和深入。

要解决中介组织截流改革红利的问题，必须坚持用发展的思路和办法解决中介组织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要拓宽中介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培育、发展和壮大中介行业，以适应市场和改革的需要；要推进政府部门与中介机构“脱钩”，打破中介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尽快从国家层面加快中介组织管理立法，理顺监管体制，为其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系公职律师)

名家论道

周为民 真正战略家有非凡定见和定力

我经常说邓小平既是大战略家，又是大战略家。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大战略家是说他是伟大的战略家；第二个大战略家是指他是思考制定大战略的家。作为这样一位大的战略家和大战略的家，他的战略思维不仅表现在能够正确制定战略，同样表现在正确战略制定以后，他以非凡的定见和定力，一以贯之地坚持，从不动摇，这是真正大战略家的特点。

(北京大学研究员)

吴稼祥 邓小平以牺牲交换改革

邓小平改革的品格，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牺牲交换改革，邓小平基本上是以自我牺牲的姿态换取党内人对他改革的赞同。他完全有资格、也有条件，作为一个不仅是实际上、也是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事实上人人都想登顶，但邓小平这个人一辈子没有登顶，最多做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常委、中顾委书记，国家主席没有做过。总而言之，他就是拿牺牲来换取大家接受他的改革的。

(爱思想网学术委员)

周为民 邓小平对约束条件把握到位

智慧是关于方向、关于全局、关于战略的洞察力。制定战略目标上，一个大跃进，是失败的例子；一个小康社会，是成功的例子。为什么一个失败？一个成功？原因就是有没有对要达到的愿望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准确的分析和把握。邓小平制定正确的战略目标，恰恰在于他对约束条件的了解把握非常到位。

吴稼祥 以目标带动转型

邓小平的改革智慧，事实上就是以目标带动转型，这一点跟当下也有关系。你说你的办法，我说我的办法，最后看哪种办法更有效，我们就采取哪种办法。邓小平当时提出的目标主要是两条，国家统一和国家富强。为了国家统一这个目标，香港澳门采取一国两制。国家要富强，就要改革开放，改变计划体制，实行市场体制。一是国家体制的转型，二是国家经济制度的转型，这两件事情应该说都是非常精彩的。

周为民 渐进改革实质是“以新化旧”

我们通常把渐进改革理解为一切慢慢来，不要太快，或者简单理解为先易后难。对不对呢？也不能说错，但是都没有抓住要领。渐进改革的要领是“先立后破，以新化旧”，这是渐进改革的实质。渐进改革不是先从旧体制的核心部分进行突破，不是那种大爆炸式的、休克疗法式的突破，而是首先在旧体制控制薄弱的地方、笼罩不住的地方、鞭长莫及的地方突破，或者主动放开旧体制控制的一部分地方来发展新体制。

萧冬连 不把意识形态争论引到经济

不要把意识形态中的争论延伸到经济体制改革，这是邓小平很重要的思想。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三次意识形态争论中有人想把争论延伸到经济领域，一次是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一次是1987年的反自由化，一次是1989以后，如果说前两次是胡耀邦和赵紫阳顶住的，那后一次就是邓小平亲自出面，解决经济领域姓“社”姓“资”的争论，不能把意识形态的争论延伸到经济领域。

(作家、曾任国防大学教授)

吴稼祥 邓小平的改革“四法”

邓小平的改革方法无非就是四种：第一种，我概括为“摸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第二个是“猫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功能主义，你是什么，就看你能干什么。第三个是“刀论”，邓小平的“刀论”就是不争论，若无必要，请勿争论。最后一个就是“糖果法”，当改革的苦头没有呈现的时候，先让你尝到甜头，所以他的改革都是甜头化改革，由浅入深，把改革进行到深处。

吴稼祥 改革是百川汇海

改革进程一定不是像发射火箭那样一飞冲天，也不可能自己诞生。改革，基本是百川汇海式的，所有河流都在奔流，方向目的是大海。但百川汇海这个过程，一定是有曲折的、有波浪的、有高低的、有宽窄的、有快慢的。如果我们把中国国力的释放，人民对富裕的追求、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看做是不可被遏制的河流奔向大海的愿望的话，那地势是永远不可能阻挡这些河流的。

洪向华 习近平执政思路

近平同志的执政目标是什么？就是实现现在讲的“中国梦”。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目标？目标是一个行动的前提，没有目标，行动就不会统一到目标上来。大家都有坐飞机的经历，登飞机的时候往往比较有秩序。上飞机之后，大家也能系好安全带，关闭手机，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命运与飞机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家共同的目标就是平安抵港，所以都很听话。

(中央党校科研部副教授)

周为民 小平说防左是针对长远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直受到左和右的干扰和阻力。对于中国的改革，影响最大或者说危险最大的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非常清醒，他提出来：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不要简单把邓小平的这个话理解为只是针对一时的情况，邓小平强调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针对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来的，我们不能够忘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告诫。

邢贲思 我不认同左的东西在回潮

现在外界对改革持悲观态度，认为左的因素在蔓延，这恐怕是认识上的差别。如果按一些人的说法，什么不叫左？把我们说的一无是处就符合实际情况？就不叫左？左和不左，要看怎么做，我不同意认为现在“在向左转、左的东西回潮”这种观点。不是左的东西回潮，而是现在有些人肆无忌惮的在那儿骂。 (哲学家)